

新时代视野下李光地研究与 中华美育精神的关系

王伟^{1, 2}

(1.泉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00;
2.厦门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阐述了李光地作为“庙堂理学家”参与乃至影响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解读其关于“教化”的思想主张及日常实践显影的东亚早期现代性追求。在新时代语境中重塑这一精神传统,能为打造闽南区域特色文化品牌,传承创新中华美育传统,促进两岸文教互动融合提供思想资源。

关键词: 李光地; 闽学; 现代性; 家风家训; 中华美育精神; 东亚海权思想

DOI:10.16312/j.cnki.cn11-3775/g4.2019.01.033

新时期以来,李光地研究的生成语境、问题意识、叙述方式与中国主体性历史建构密切关联,呈现重返历史现场与融入当代生存实践的统一;作为地方性知识生产风潮的重要生成物,体现多重话语力量在公共言谈空间的热烈竞逐。

一、从闽南发现历史:国家视野下的地方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如何讲好“在海峡两岸及东南亚华人社会中有着广泛影响”的李光地故事,进而讲好文化环流中的闽南故事乃至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故事,不仅是闽派学人不懈思考的重要问题,也是地方乃至国家有关部门希望解决的议题之一^[1]。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便是1992年9月于福建安溪(李光地出生地)召开的“纪念李光地诞辰150周

年学术研讨会”^[2],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在这场规模空前的专题研讨会上发表宏论,碰撞思想。会后,主办方为了有效保存并进一步扩展会议成果,从内容涵盖“李光地历史功绩、思想文化建树及有关民俗、碑文、祖籍家世等方面”的62篇会议论文中精选出42篇,以《李光地研究》的醒豁题名公开出版,从而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3]。

以此为界标,海内外汉语学术界特别是闽台文史界在“后新时期”不断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打开新的研究思路,拓宽新的研究视野,创设新的专门研究平台(如泉州经贸学院于2013年挂牌的“李光地文化研究中心”,泉州师范学院于2017年挂牌的“福建省李光地研究院”),取得引人瞩目、厚重丰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后期伽达默尔诠释学美学研究”研究成果(12CZX078);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本硕博一体’新文科框架下的新时代闽南审美文化课程教材建设”阶段性成果(FBJG20180195);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课题“新时代闽派美育视阈下的闽南戏曲文化传承发展研究”(FJJKCG18-137)

的累累硕果；其影响已然溢出传统文史领域之外，在现实社会层面持续发酵，绵延及今，社会现实因素也促进设置这一领域的研究议题，进而不断改写学术研究版图。例如，作为台湾同胞重要祖籍地的安溪（亦是“光地故里”）视李光地为“地方形象代言人”，规划主题公园建设，垦拓文化旅游产业，创构两岸交流平台，把“李光地文化”作为本地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之一”，催产出了诸如《名人文化产业与地方经济腾飞——以李光地文化为例》《浅析泉州传统民居的旅游开发——以安溪李光地故居为例》等对策研究。

在增添或涌现不少全新参数的新时代，在今日与历史“视差之见”下进行系统盘点与阶段总结，不仅可行，而且必要。由之，在“政、产、学、研”等多方力量的合力推动下，李光地的家乡在2017年先后举办2场相关会议，即6月在安溪湖头镇举办的“李光地与儒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及12月在泉州师院举办的“李光地研究座谈会”。在后一场会议上，本文有心套用一个常见语式问道，“当我们在讨论李光地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他的什么？”此举并非为了哗众取宠、“搏位出道”，而是有意提醒在场与不在场的学人在对“李光地+”研究模式日渐习以为常的今日，应该在不断被重构的文化生态中反思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的多重辩证，以便在各种外在尺度进场干预的众声喧哗中强化理论自觉与完善思维进路。

具体而言，一方面研究对象询唤研究主体的历史生成、现实确立和未来影响；另一方面，具有自我意识的研究主体也在不断建构或重构研究对象。由于李光地本身具有理学大家、济世名臣、南管知音等复杂多重身份，“既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也是一个久存争议的人物”^[4]，缘此在何种位置中的人们以何种目的、何种方式来打开这位传奇人物，其就会呈现出何种面孔。这就意味着，对于这位富于话题性的人物论述不能囿于论说主体固有的预设问题，拘泥于单向单一的研究视阈，而是要藉由多维视角进行跨学科、宽领域的全方位透视，才能开启久被遮蔽的内面。不言而喻，“我们”于此就不再是一个整齐划一、不言自明的思想前提，而是一个布满裂隙、迫切需要反思的历史问题，作为

研究主体的“我们”似有必要进行自我反思，或者须被他者置于时代视镜下透视剖析。由之，“谈论李光地的我们是谁”，“我们与谁同属一个社群与一个时代”，“我们为何要谈论李光地”，“我们以何谈论李光地”，“我们在何种生态下谈论李光地”的一系列叩问于焉是起。

二、敞开与遮蔽：还原历史还是发明传统

关于李光地的论述存有学界、民间、官方3个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影响的“话语场域”，并在这种张力结构中呈现出诸种不同面向：审美价值与文化内涵兼备的文学作品，熔知识性与可读性于一炉的普及介绍，史实发掘与学理探勘并重的专题基础研究及其衍生的服务国家与地方某种战略需求的综合应用研究。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体式杂糅的民间资料编撰，如苏旺太于李光地诞辰360周年之际特别编撰的《盛世良相李光地》一书，可谓虚实相生，古今杂陈。翻阅其书，可见李光地所做文章与今人研究论文共存，除此之外，其书既原样收录碑文传记历史文献，也刊载苏先生新近创作的同名电视剧脚本，还附有妙趣横生的民间传说，一种后现代的拼贴感扑面而来^[5]。

现今坊间流通多部以李光地为对象的通俗文学读物，如李树砥撰写的《“赤脚宰相”李光地》，叶茂樟主编的《李光地民间故事》。二者均带有明显倾向性地将之描绘为“一心为民的廉洁清官，足智多谋的智慧化身，忠君爱国的股肱之臣，亲民宽厚的谦谦君子”^[6]。一如文学史上层出不穷、结构相似的众多民间传说故事，上述李光地故事本身不一定“真实”（现实发生），但其表达的精神诉求却极其“真实”（想象真实）。上述文本序列塑造一位比真实人物本身更加“接地气”、更符合普罗大众心中清官形象的李光地，在原型层面反映乡土中国子民挥之不去、根深蒂固的“清官情结”，在现实层面折射地方普通民众与乡土豪族势力之间“某种微妙的紧张态势”^[7]，在审美超越层面显现“闽南族群特有的情感心理结构与生存体验方式”^[8]，从而在凝固板结的“正史”大叙事之外，提供一种想象闽南乃至想象中华的别样方式。

与含有虚构性、情感性、倾向性的文学性作品

有所不同,许苏民不忘初心,在其长达30万字、常人不易阅读、受众面不大的早期学术专著《李光地传论》基础上,推出篇幅较短、发行量大、贴近市场的《大家精要:李光地》,显然属于从事知识生产的学院知识分子接受时代召唤,介入公共空间以传播知识的产物。这一“大家小书”在简要介绍李光地生平经历的基础上,全面而又精炼地概括传主丰富驳杂的理学、易学、政治、信仰、科学等诸多维面的思想主张,进而在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坐标系中重新评价这位名人的思想史与政治史意义,令人信服地指出其长期饱受争议、一度受到冷落的现实因由。于此,本文赞同吴根友的观点,认为许苏民独具匠心、别具慧眼的创新之处,在于较早地从那些居庙堂之上、占据正统地位之官方道学家(以李光地为典型代表)的主导性论述,而不是从那些处江湖之远、与主流保持距离之另类思想家的零星批判性言论来寻绎明清之际的启蒙现代性。

总之,这些应时而生、注重传播效果的普及读物,行文明白晓畅,文情并茂,内容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影响面可能更广,即满足普通民众了解与亲近这位“一代之完人”(雍正帝语)的基本需求,有力呼应“大国崛起”时代之复兴传统文化的滚滚热潮。与之相映成趣的是,问题导向明确、具有较高门槛的学术探究尽管可以细化为多个方向,但都具有相当一致的问题意识,即共同指向中国主体性的历史建构问题,现将之置放在东亚早期现代性的叙事脉络中略做评述。

三、东亚现代性:多维透视的跨界动能

(一)路标与坐标:世界海洋时代的东亚海权论述

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大格局中审视李光地在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宝岛台湾的影响作用,彰显其“不与分裂势力妥协,统一高于一切”的思想^[9]。无须讳言,身为汉臣、来自闽南一隅的李光地之所以能在波橘云诡、惊心动魄的仕宦生涯中屹立不倒、步步高升,甚至罕见地被深谙帝王术的“千古一帝”康熙褒誉为“情虽君臣,义同朋友”^[10],原因不仅在于李光地才学、政绩、权术兼具,更源于其对大清王朝的矢志忠贞。这种赤胆忠心并非无事之时

的慷慨陈词,而是历经险象环生的重重考验,其最初的正面表现便是面对“三藩”之一耿精忠的态度。彼时请假归乡的他面对后者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不为所动,用计逃脱,并冒着巨大风险向朝廷献上切中肯綮的《蜡丸疏》,试图帮助清军出奇制胜、平叛成功,以反对分裂的实际行动维护家国天下的完整与和平。

被大众媒体着力刻画与大陆学界大书特书的无疑是李光地在统一台湾这一国家重大历史事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乃至官方都普遍认为,李光地高瞻远瞩、远见卓识,从大一统国家的长远发展与根本利益出发,力谏清廷抓住时机收复台湾,不仅亲力亲为出谋划策,还颇具胆量地以“湖李”全族性命保举施琅复出“专平海事”,最终实现台湾顺利回归,巩固东南海疆安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李光地关于东南海防的观点、大陆与台湾关系的论述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渊源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泉州发达的商品经济与海洋文化,因而能够超越东亚陆权体系的传统思维范式,于不期然间开创了有别于近代西方海权理论的“东亚早期海权思想”,构成今日海峡两岸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家国同构:治国理政思想与家训族规民约

结合数十年宦海沉浮、躬行举措来挖掘李光地的治国理政思想,致力探讨其身作为康熙朝的股肱之臣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繁荣昌盛殚精竭虑。不言而喻,治河是清朝皇帝关怀民生、体恤民情的德政体现,亦是李光地主政京畿直隶实利惠民的突出政绩,因而也是素有以古鉴今传统之学界中人的关注焦点。尽管有论者依据现代水利科学而对李光地治理漳河、永定河时所采用的某些具体策略及其长远效用存有不同看法,但都对其在整个治水过程中表现的民为邦本的为官理念、谨慎清勤的为官态度、刚正不阿的为官风范褒誉有加,并将李光地治理水患的成功与其脚踏实地、倡导实学的务实作风进行关联考究^[11]。

“在农耕帝国,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缩小”^[12],家国同构,难以剥离。因之,近年来有多位学

者(特别是福建地方文史界)据此“个人-家-国”三位一体之思想逻辑来审视李光地廉洁奉公、清正有为、爱国爱家的家国天下情怀,从而将宏观层面繁复丰饶的治国理政思想落实到微观层次正己谕后的族规家训,勾连二者之间相互映衬、彼此托举的辩证关系。正是在此意义上,晚年李光地亲自拟定的家训族规(如《家训·谕儿》《诚家后文》《本族公约》等),以及民约村规(如《同里公约》《丁酉还朝临行公约》等),不仅被念兹在兹的众多本地学者(如以研究家族文化见长的泉州师院图书馆原馆长苏黎明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叙述为李光地个人成功成长的重要支撑,还被视为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影响当地民众言行举止的精神文化而加以悉心开掘,并联系实际地将这种嘉惠后世之精神财富的传承与弘扬,上升到国家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建构层面。

(三)史实与现实:诉讼纷纭的“三案”之争

历经多年的反复讨论,学者普遍接受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立场,认为针对李光地这一生活在特定时空、具有特殊身份之重要历史人物评价,应该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从大处着眼考查其是否顺应历史发展大趋势,真切推动社会进步,而不要在研究对象的某些个体枝节问题上浪费笔墨、纠结不清。在此大前提下,有学者对涉及李光地个体德性层面的“三案”保持浓厚兴趣,并在现存有限材料的基础上发挥主体学术想象力,建立碎片化史料之间的关系网络,从而在灵动而又严谨的学术操演中给出能够自圆其说的别样解释。

自从广搜乡邦文献、专研宋与南明史事的全祖望指责李光地“初年卖友,中年夺情,暮年外来妇子归”^[13](特别是“首案”中李光地与陈梦雷两人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怨情仇),当中的真伪、是非、曲折在有清一代就引发士林关注,到了外患冲击严重、民族意识高涨的近现代更是由于“梁启超、钱穆、孟森、谢国桢等人的沿用”^[14],愈发为人所知晓并进而投射各自的情绪。于此,不少闽籍学者(如福建省社科院李鸿烈研究员)愤愤不平,发自肺腑地为李光地鸣冤喊屈,一以贯之地认为“卖友之说”是“捕风捉影并无充分依据的市井浮说”^[15]。

与之相衬的是,有些省外学者转换了回应问题

的角度,摒弃体力比拼式的繁琐事实考据与简单思维模式,目光既不局限于康熙朝官场的相互倾轧、争权夺势,也不胶着于个体私德层面的细枝末节,而是有意将之放置在明清鼎革的时代大背景并结合全祖望个人经历与思想倾向,有理有据地理性剖析全祖望为什么持有并散布这种说法,从而超越了“就事论事、就人论人”的意气之争。在这些学者看来,具有浓厚遗民情结并经常反刍这种伤痛的全祖望等人,在内心深处认为李光地“自摧汉族”“鬻道于虏”“大节有亏”,但却迫于当时形势而不敢也不好明说,“只好借损他名誉的办法一吐怨气”^[16],藉由攻击李光地的道德来间接否定其学问。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学者藉由话语权力理论回顾李光地与陈梦雷之“同”与“不同”、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指出其背后显影的是两种学术路径,及其所衍生之仕途升迁的选择争执,进而意味深长地将之描述为康熙王朝的一场学术主导权争夺战,并以小见大、由点及面地勾画了有清一代汉族文人士大夫的心灵镜像。在上述学者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朋友反目成仇、势同水火之有违常情、有悖常理的状况,更深处是二者所代表的不同力量为博取最高统治者之重视与肯定的激烈竞逐,是以,前者所代表之“理学阁臣”与后者能代表之“辞章高官”的深层理念差异^[17],远远大于二者“同年,同里,同官,情投意合,最称莫逆”的浅层情感认同,而这种分歧在进场博弈的各方势力或明或暗的推动下终于爆发^[18]。

(四)会通中外:文化环流中的守正出新

延展至清的中国学术进入全面系统的总结阶段,而李光地便是这一时段学术高原上所隆起的思想高峰,故而吸引不少年轻学人以之为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透过“庙堂理学家”李光地那些布满裂隙的“受压抑文本”来观照其书写主体^[19]。当中代表有南开大学姚爱娟的博士论文《李光地经学思想的哲学研究》(2014年),福建师范大学李志阳的博士论文《李光地易学研究》(2014年),山东大学刘淑君的硕士论文《李光地易学哲学研究》(2018年)等。这些论文虽然时间有先后之别,但内容乃至具体标题名称多有叠合,原因在于上述研究的整体架构与书写方式深受现代性之历史意识的影响,将李光地本人

思想置放在中国思想史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发展脉络当中审视,梳理其如何在跌宕起伏的历史大拐点中因应当时的实际情况,批判性地汇融程朱理学、阳明心学而提出的“理即性”的思想,进而在主体间性的“性本体”层面打开或曰释放出新的思想空间,并以“正学”之面目规划影响清初的学术思潮与文脉传承。

通过细腻解读李光地那些蕴涵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个体与时代之矛盾张力的浩瀚文本,似可见追随皇帝喜好而倡导复兴“朱子学”的李光地在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显然不在于其学说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冲击力与原创性,而是体现于其有感于改朝换代、价值崩解的时局变化,在指令性的著述编撰活动悄然中融入转型期中的生命体验,实现对前人学说的创造性转换与转换性创造,从而为马上得天下、文化相对落后的清代统治者组织一套能够论证自身合法性的观念形态体系。进而言之,不同于那些处江湖之远、自我放逐于体制之外的边缘思想家,出身闽南名门望族、身为官宦后代的李光地,不仅少年得志、科考顺利,而且长期居于中枢位置并最终位极人臣,深受雄才大略、颇有文治武功之康熙大帝的关照与信任,这一方面促使其思想主张与言说方式,无法像那些愤世嫉俗、郁郁不得志的文人骚客那样富于批判锋芒、具有学术个性,而是需要四平八稳、圆融折中;其必须刻意压制个人心意、体现官方身份,更多顾及乃至迎合最高统治者的治理策略与统治意志,以便为矛盾丛生、缺乏共识的彼时社会提供一种修复性力量,从而更为有效服务于主流价值体系的重构与庞大帝国的长治久安。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朝廷钦定之官方正统的身份加持,使李光地的学说全面而深刻置入彼时有心仕进之天下文人的自觉意识当中,使其在当时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比今天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在野思想家”(如王夫之等人)更具显示度与实践效能。

由于明清之际是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环境时代,除了前述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内部又有理学与新学的分野对峙)遭遇,更有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汇,身处其间的李光地及其所代表的帝国官僚

如何看待传统天下体系之外的海外文明成为新近学术生产的又一兴奋点。

在这一问题上,除却那些具有浓烈乡土情结、喜好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本地文史爱好者之外,多数学者都能秉持应有的当代学术公心而从正反两方面的辩证立场来评价这位帝国官员。在他们看来,不管基于何种目的与动机,学问优长、讲求实学的李光地以兼收并蓄、务实开明的包容姿态,努力学习域外传来的三角、几何等数学知识,探究新起的“质测之学”,感叹并肯定西方先进科技的价值功效,属于“‘中体西用说’的萌芽”^[20],难能可贵,值得肯定。然而,李光地试图将现代科学与技术纳入封建名教的前现代纲常体系,显然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误读”,而这种并非个体的偏见,既体现了李光地所代表的传统文人士大夫在思想胸襟与历史视野上的保守性和局限性,也表露这一群体对话语阐释权在外部冲击下可能发生转移乃至旁落的敏感与警惕。

四、结语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故事所讲述的年代,问题的关键在于讲述故事的年代”。故事的内容是什么,显然无须多言,因为这是本文以及在2018年12月再次召开“‘李光地研究’学术研讨会”的会议主题。为什么要讲述这个故事,源于李光地的心路历程叠印着“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21],触碰到“什么是中国现代性”的时代核心问题,因而不仅具有历史性与学术性,还体现现实性与实践性。

“讲好李光地故事”,能为延续“八闽海丝文脉”,打造闽台区域特色文化品牌,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两岸文化互动融合发展提供宝贵资源。在明确这一点之后,就不能只是悠然的坐而论道,而是要急切的起而行之,在参与历史伟大实践中回答如何在新时代讲好这个故事。

参考文献:

- [1] 刘益清,张晓斌,吴清远.文化“出海”,展新魅力[N].福建日报,2017-07-21(2).
- [2] 敬木.李光地学术讨论会综述[J].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

(下转第111页)

的技术优势,积极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播、收集、整理和保护等工作。

媒体传播方面,应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语言的广播电视建设和书籍报刊出版工作,开设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电台和少数民族语言电视卫星频道,建设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广播影视译制中心,确保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群众能听到看到本民族语言的广播影视节目和本民族语言的出版物。让更多的少数民族人们能更快更多更好地了解国家政策,打造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播平台,促进各民族的和谐相处。

少数民族语言数据库的建立是保存和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有效途径。云南民族大学经过近10年的努力,目前已建立了彝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景颇族、布朗族等民族的20种语言数据库。同时,依托该数据库,还建立了供教学和科研使用的云南少数民族语言实验室,人们可以方便地模仿学习和分析研究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的语言资料并予以保存。

致谢: 辽宁科技大学2018年校级教学改革项目

参考文献:

- [1] 搜狐网. 教育部:2017年来华留学48.92万人[EB/OL]. 搜狐网, https://www.sohu.com/a/226787075_340226, 2018-09-20.
- [2] 张莹莹. 1.88万名外国留学生在云南就学[EB/OL]. 云南政协新闻网, <http://www.ynzxb.cn/xwpxd/ShiZhengXinWen/141512.shtml>, 2018-09-20.
- [3] 新疆政府网. 《关于印发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文化科教中心(教育部分)建设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EB/OL]. 新疆政府网, <http://www.xinjiang.gov.cn/2017/07/18/142198.html>, 2018-09-20.
- [4] 陈敏.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语言文化安全研究[J]. 文化软实力研究, 2018(2): 71-77.
- [5] 李琳. 语言的国际推广与国家的文化安全研究[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15(5): 173-176.
- [6] 李宇明. 和谐语言生活减缓语言冲突[J]. 语言文字应用, 2013(1): 10-11.
- [7] 安梅. 双语环境下的少数民族语言维护[J]. 贵州民族研究, 2011(1): 185-190.
- [8]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1.
- [9] 李宇明. 和谐语言生活减缓语言冲突[J]. 语言文字应用, 2013(1): 10-11.
- [10] 1992, 12(6): 73-78.
- [11] 杨国桢, 李天乙. 李光地研究[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3: 438.
- [12] 陈祖武. 论李光地的历史地位[J]. 福建论坛: 人文社科版, 1992, 12(5): 62-68.
- [13] 苏金太, 李金德. 盛世良相李光地[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259.
- [14] 叶茂樟. 历史的镜像, 心灵的洗礼——试析李光地民间故事传说[J]. 攀枝花学院学报, 2017, 34(1): 42-47.
- [15] 钟建华, 钟金德. 民间故事传说的李光地形象[J]. 闽台文化研究, 2016, 11(4): 94-99.
- [16] 王伟. 海峡两岸共同记忆中的闽南戏曲文化图景[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8: 109.
- [17] 郭莉. 道学家李光地的天下观[N]. 福建日报, 2017-07-24(11).
- [18] 童超. 图说中国历史: 康乾盛世[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85.
- [19] 王鍾翰. 清史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718.
- [20] 徐勇. 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道路[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 37(7): 4-25.
- [21] 全祖望. 结琦亭集外编(卷44)[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73.
- [22] 曾纪鑫. 也谈李光地卖友案[J]. 书屋, 2016, 22(9): 71-75.
- [23] 李鸿烈. 关于李光地“三案”的辨析[J]. 福建论坛: 人文社科版, 1992, 12(9): 66-71.
- [24] 李洁非. 如何恰当把握历史的“大节”[N]. 中国青年报, 2017-07-25(4).
- [25] 赵刚. 解读李光地卖友求荣案[J]. 读书, 2015, 37(3): 144-150.
- [26] 王鍾翰. 清史新考[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 141.
- [27] 王胜军. 清初庙堂理学研究[D]. 长沙: 湖南大学, 2011.
- [28] 方小飞. 李光地理学思想研究[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08.
- [29] 吴根友. 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1.

(上接第108页)